

“小李杜”诗文中晚唐长安的历史记忆

米彦青

【摘要】长安作为唐王朝的都城,衍生出多重社会网络,成为唐代诗人的“记忆之场”。作为“记忆之场”的长安在“小李杜”诗文中呈现出杜牧樊川别业和李商隐樊南新居带来的物质性,宫廷政变、牛李党争、藩镇割据、河湟争夺带来的功能性,围绕李贺、元白诗学认知带来的象征性等特点。三者互为条件,成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感受长安并以长安为内核突破各种边界持续交往、彼此认同的基础和动力。

【关键词】杜牧;李商隐;物质性;功能性;象征性

【作者简介】米彦青,女,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原文出处】《内蒙古社会科学》(呼和浩特),2023.2.142~15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编号:18ZDA237);国家社科基金领军人才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交融与传播研究”(编号:22VRC196)。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以其还原历史的手法和生动叙事抓住了无数观众的心,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长安也成为高频词汇。“生长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无论长安给剧中人物带来的是苦乐还是悲喜,他们都对长安情有独钟。翻检《全唐诗》发现,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唐代诗人的笔下。今存长安诗歌2000余首,由422位诗人写就,188位诗人的诗作中均有长安字眼,占比44.5%。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中提到的唐代诗歌史上有所建树的49位诗人都曾到过长安,并写下了与长安有关的诗句。由此可见,长安在唐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和国际化的时代”^{[1](P.145)},“早在隋代就已奠基的长安城,无论在城市规模还是繁荣程度上都堪比拜占庭”^{[2](P.143)}。长安,实际上可以被定义成一个“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3](P.20)}。本文从物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三个层面对李商隐、杜牧的长安诗歌进行解读,讨论长安这座“记忆之城”如何成为唐代诗人的“记忆之场”,从而探求唐代长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价值。

一、“小李杜”的樊川牵绊——长安“记忆之场”的物质性意义

“地理学上的城市,是指地处交通方便环境的,覆盖有一定面积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结合体。”^①长安作为一国之都,其都城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实在化的物质场所。《管子·度地》有言:“内为之城,城外为之廓。”^{[4](P.317)}唐代的长安城人口密集、交通便捷、屋舍林立,是物质的、实在的场所。“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5]虽然研究唐诗者鲜有不知清人刘熙载对晚唐“小李杜”诗歌的这一评论,但很少有人关注“杜樊川”“李樊南”与樊川的牵绊。

樊川位于长安城南,杜牧晚号“樊川居士”,别集名为《樊川集》。就地理位置而言,樊南指樊川南部,李商隐号“樊南生”,别集名为《樊南集》。就个体存在而言,名号中有地缘,显然与此地有情感牵绊,通常多是故园忆念的方式。就士人身份而言,生前裁决文字编选别集的“小李杜”将身后的名山事业与地缘相连,表达的当然是对此地依依不舍的情愫。就长安来说,杜牧是本地人,李商隐是外省人。杜牧是“城南韦杜,去天五尺”的杜氏传人,城内城外杜家产

业众多,樊川之所只是别业而已。李商隐作为外省人,长安不易居,相较于城内,城郊樊南是他能追望长安的最近所在。

德宗贞元十年(803)春,白居易、元稹等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白同授秘书省校书郎。五月,吐蕃遣使入朝(802年,吐蕃大相论莽热率兵十万攻维州,西川节度使韦皋大败之)。在唐代的诗歌史和政治史上都值得记忆的这一年,杜牧出生于长安。八年后,宪宗元和六年(811)二月,长安、洛阳等地大雪,韩愈、白居易、卢仝皆有诗记之。此年,李商隐出生于河南获嘉县。宪宗元和七年(812),长安人杜牧和外省人李商隐的家里都发生了一些大事,而唐诗史和政治史上的这一年也有值得记忆的事件发生。六月,岐国公杜佑致仕。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其军奉其幼子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十月,魏博军拥都知兵马使田兴为留后。田兴上表朝廷,表忠心,诏下,即以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十一月,杜佑卒于长安杜宅,享年78岁。十二月,唐朝宗室大郑王(李亮)房的李贺门荫入仕,授奉礼郎,去往长安。这一年杜牧10岁,史载杜佑“性勤而无倦,虽位及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6](P.2500)},杜佑对杜牧的影响极大。开成四年(839),37岁的杜牧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回忆祖父在世时的美好光景,“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所谓“家集二百编”,便指杜佑所撰《通典》。也就在这一年(812),两岁的李商隐家里也发生了一些令人悲伤的事情,本年末,裴氏仲姊病故。李商隐回忆说,“此际兄弟,尚皆乳抱,空惊啼于不见,未识会于沉冤”,“兄弟空哭于归魂”。^{[7](P.814)}

宪宗元和九年(814)秋,李贺离开长安,客游潞州。十月,朝廷以严绶为申、光、蔡招讨使督诸道兵征讨吴元济。十一月,令狐楚由职方员外郎知制诰为翰林学士。这些事件表面上与杜牧、李商隐并无交集,然而,日后他俩都与这些人、这些事产生了纠葛。《旧唐书·杜牧传》云:“牧从兄侔隆盛于时,牧居

下位,心常不乐。”^{[6](P.2500)}杜侔以门荫入官,又选配公主,仕途很是亨通,一直做到宰相,乾符元年(874)卒,享年80岁。家族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较之堂兄,自恃才高的杜牧仕途困蹶不前,他因此“不乐”。814年外省人李商隐4岁,九月,李商隐父李嗣获嘉县令期满,应浙东观察使孙简辟任,约于年底到了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自此李商隐开始了“溯水东西,半纪漂泊”^{[7](P.841)}的从幕生涯。

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唐宪宗为宦官陈弘志等所杀,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此年,杜牧18岁,杜牧的父亲杜从郁于前几年去世。至元和末,杜牧兄弟的生活已非常窘迫。如其所述:“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而已。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竖,恋恋悯叹,挈百卷书,随而养之,奔走困苦,无所容归,死延福寺庙,支柱欹坏而处之。长兄以驴游丐于亲旧,某与弟鬻食野蒿藿,夜无寒烛,默念所记者凡三周岁。”^{[8](P.244)}就在这一年,李嗣卒于浙西观察使幕任上,10岁的李商隐和家人一道护送着李嗣灵柩戚戚惶惶地踏上了返回故乡郑州之路。所谓“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躬奉板舆,以引丹旌。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祔故丘,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7](P.814)}。

失去父亲的杜牧和李商隐都奋发图强,想要通过科举入仕光耀门庭,然而科举入仕后的他们在唐帝国的版图内兜兜转转,最终未能在长安朝堂上大展宏图。杜牧在长安任职加起来有七八年的光景,李商隐在长安及其周边任职满打满算也不到五年。无论是长安人还是外省人,长安在诗人们的心中都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长安梦还是以杜牧、李商隐为代表的唐代人的共同梦想,哪一个读书人不想在长安实现自己的抱负呢?

开成五年(840),30岁的李商隐以到长安“从调”的理由从弘农尉任上辞了出来。随后便把在济源的母亲和在泾州的妻子都接到了长安居住。新家樊川南,他因而自号“樊南生”。彼时,他在长安朝堂上

并未立足,此次全家团圆于西京郊外之举是诗人长安梦构想中的重要环节。宣宗大中五年(851),杜牧49岁。此年秋,杜牧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八月晚些时候,杜牧赴职归京。回京后,尽吴兴俸钱修建位于长安城南的樊川别墅。樊川别墅位于长安城南的下杜樊乡朱坡,是杜牧的祖父杜佑在此处修建的一处园林别业。《新唐书·杜佑传》记载:“朱坡樊川,颇治亭观林芳,凿山股泉,与宾客置酒为乐。”^{[9](P.5009)}可见,樊川别墅不仅是风景优美的休憩之居,也是杜佑与士人宴集社交之所。实际上,樊川别墅也是杜佑的天伦之乐所在,杜牧在樊川渡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而他在家道中落后的困顿更凸显了樊川的幸福感,因此,他在知天命的年龄把毕生积蓄都投掷到修整樊川别墅上。

“小李杜”晚年与长安人和事的牵绊同样值得探究。宣宗大中六年(852)春,42岁的李商隐抵达西川节度使府,拜见了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杜棕,并连献两首恭维他的长诗。这一事件似乎没有史料证明杜牧是否知道或在意。夏秋间,50岁的杜牧迁中书舍人。八月,杜牧在长安作《华清宫三十韵》,温庭筠和诗。秋,杜牧约沈询同游樊川,沈询未至,杜牧遂泛然独游,并作《秋晚与沈十七舍人期游樊川不至》。冬,杜牧病卒于长安安仁坊杜宅中,享年50岁。妻子河东裴氏已先杜牧卒,生四子一女。

宣宗大中五年春天,卢弘止卒。李商隐幕府罢归长安,归来得知妻子王氏已于此前病故。宣宗大中七年(853),43岁的李商隐依旧在梓州,意气消沉,心情抑郁,其《写意》诗有“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之句,乡心之切可见一斑,但不知此“乡”是都城长安还是河南故里。十一月,杨筹来到梓州幕,李商隐听他谈起寄养在长安亲友家中的儿子衮师,写下了思子诗《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衮师》。十一月,李商隐编定《樊南乙集》,并撰序记之。宣宗大中九年(855)十一月,柳仲郢府罢,李商隐随之归京并于次年春季抵长安。李商隐在长安闲居的这段时间心境悲凉,其《幽居冬暮》诗或作于此时。不过,当年(856)十二月柳仲郢奏任李商隐为盐铁推官。宣宗

大中十一年(857),47岁的李商隐病废罢还郑州。次年故去。

尽管“小李杜”的名号均与樊川有关联,亲手编订的身后集也与樊川有关联,然而,杜牧卒于长安城内故居,李商隐卒于河南故居,他们并没有选择樊川别业和樊南居所为自己离别人世之所。樊川是长安城郊之地,这里比外省更易得到有关长安的学术、思想新潮以及敏感话题,但它又不处于长安城中。而立之年的梦想起航与不惑之年的退守故园,两颗飘荡的心灵不期然地在樊川一隅的时空中相逢。“小李杜”选择樊川是必然的,他们生命历程中的不期而遇也有多次。无论身在何处,诗人的心灵如流云般飘荡于长安上空,凝贮于“北阙”与“南山”,在他们的长安视野中,我们可以溯望晚唐历史。

二、“小李杜”长安视野中的晚唐历史——“记忆之场”的功能性意义

奠基于长安这一政治文化中心,史家常常秉持某一时刻的合理性来叙述历史,但透视长安理应有不同的方式,以晚唐诗人的视角构想相同历史时空中不同行动主体的意识,似乎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尝试。

大唐政局的核心涉及对外关系、对内关系以及朝堂政争。对外关系在唐后期集矢于西北之吐蕃、北境之回鹘,对内关系体现在藩镇割据上,无论是对外关系抑或对内关系,都会影响朝堂,也间接体现为朝堂政争,而朝堂政争则凸显为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作为中下级官吏,“小李杜”少有在朝堂发表言论的机会,然而他们对长安、对唐廷的关切却始终如一。无论是作为局外人发声,还是被动地成为局内人前行,后人均可以藉其管窥晚唐士风及士人的政局观。

(一)权力斗争的场域功能: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

“文化的功能记忆是和一个主体相联的,这一主体认为自己是功能记忆的载体或承担主体。”^{[10](P.151)}晚唐时期的长安承载着沉痛的历史战乱,因而具有了历史记忆的功能性意义。究讨河湟得失与藩镇之乱,晚唐朝政不宁恐怕是外祸不断的缘由,而长安宫

廷中的宦官专权与朝堂上的牛李党争便是政局乱起之源。长安变局中的杜牧和李商隐或多或少地都与其中的人和事有所纠缠,并影响着其生命进程。

1.宦官专权 宝历元年(825)二月,敬宗即位后,昵比群小,游幸无常,又大兴土木,广起宫殿,23岁的杜牧作《阿房宫赋》以刺之。文宗大和二年(828)二月,26岁的杜牧在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试,以第五名及第。三月,杜牧到长安应制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授官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此次制举考试,杜牧、李甘、郑亚、裴休等22人登第,同考的刘蕡因在策文中大胆揭露宦官之祸,引起朝野震动,有司不敢录取,落第。不过,杜牧对刘蕡没有什么好感,也没有诗文记录这一政治事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刘蕡因言获罪、流贬于各大幕府时,李商隐却与他相见恨晚,他们在兴元令狐楚幕府相识后,李商隐对刘蕡的身世遭际深致惋惜。宣宗大中二年(848)正月,李商隐自江陵东下,在湘阴黄陵一带遇见了自柳州前往澧州的刘蕡,并写下《赠刘司户蕡》一诗,对人生际遇与动荡时局感慨万千。刘蕡去世后,李商隐悲痛之余为他接连写下了《哭刘蕡》《哭刘司户二首》《哭刘司户》等四首悼诗。“平生风义兼师友”表明李商隐将刘蕡视为亦师亦友的人物。阿莱达·阿斯曼说:“诗人的声望是一种记忆功能。这种功能使名字变得不朽,从而也使身体的死亡得以超越。在这样的文化中,诗人被认为具有一种特殊的远程交际的能力(或者魔力),利用这种能力他可以对后世的、还未出生的接受者施加影响。”^{[10](P.33)}杜牧与李商隐的名字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依旧不朽,这份荣耀源于他们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感悟。感之于心,述之于口。李商隐对于刘蕡的悲悼使其成为晚唐历史记忆中声讨宦官专权的代表。

大和五年(831)二月,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宋申锡谋之于京兆尹王璠,王璠泄密,宦官头子、神策中尉等人遂指使手下诬告宋申锡与文宗弟漳王李凑谋反。三月,贬漳王为巢县公,宋申锡被贬为开州司马。受牵连者数百人。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与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事泄,宦官由是

大杀朝臣,幽禁文宗,史称“甘露之变”。这场关于皇权统治的内部争夺战致使大唐走向衰败,“沉默的废墟只能借助在记忆中保存的传承故事才能发出声音”^{[10](P.374)}。万马齐喑的长安也在经历战乱荼毒的过程中见证并塑造了历史。此年,33岁的杜牧由淮南幕转监察御史,赴京任职。七月,好友李甘因反对郑注,被贬窜为封州司马,杜牧忧惧之下,托病得以分司东都洛阳。同年春,李商隐第四次参加礼部进士试,依旧铩羽。落第后,约于秋季返回郑州。“甘露之变”发生后,25岁的李商隐极为震惊和悲痛,《有感二首》《重有感》等一字千钧的政治诗均酝酿于此际。《蔡宽夫诗话》云:“义山诗集载《有感》篇而无题,自注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其中有‘如何本初辈、自取屈辱诛’,又‘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之语。按李训、郑注作乱,实以冬至日,是年岁在乙卯,则足诗盖为训、注作也。”^{[11](P.400)}

开成元年(836),代表李商隐政治态度的《有感二首》《重有感》完成。“安危须共主君忧”(《重有感》)不只是在说手握重兵的刘从谏,也是个人心声的吐露,三首诗明确表达了诗人对于朝堂政争的关切和政治态度。相较之下,在宦官专权事件中李商隐这个布衣外省人比杜牧这个朝官长安人的态度更加积极。

2.牛李党争 大和二年十月,李商隐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令狐楚由宣武军节度使入为户部尚书。大和三年(829)三月,令狐楚由户部尚书改任东都留守,白居易等人赋诗送行。19岁的李商隐迁家至洛阳。令狐楚到洛阳后,李商隐“以所业文干之”,“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6](P.3209)}此为李商隐受知之始,与令狐绹的关系亦始于此。十一月,令狐楚自东都留守调任天平军节度、郢曹濮观察等使,辟李商隐为巡官。大致从此时起,令狐楚开始教李商隐学写“今体”。大和四年(830)正月,时任武昌节度使的牛僧孺召还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杜牧寄诗给牛僧孺,称颂他离任前的政绩,所谓“六年仁政讴歌去,柳远春堤处处闻”(《寄牛相公》)。九月,沈传师迁任宣歙观察使,杜牧随之到了宣州。不久奉命去京

师。十月,李德裕受李宗闵、牛僧孺排挤,由义成节度使转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约于此年,李商隐在令狐楚的资助下随计上都,参加科举考试,惜本年落第。大和五年,21岁的李商隐再次随计上都,准备参加来年的进士考试。李商隐在令狐楚幕中除处理公务外,还参与令狐楚的游宴聚会。今集中《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时蔡京在坐京曾为僧徒故有第五句》等诗就是这一经历的真实反映。大和六年(832)十一月,牛僧孺因处置吐蕃维州守将归顺事失当,上表请辞相位。十二月,李德裕由西川节度使改任兵部尚书。次年(833)二月,令狐楚调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此时李商隐正在长安第二次参加进士试。落第后,李商隐去太原,入令狐楚幕。据刘学锴《李商隐传论》,李商隐似曾随行入京,或令狐楚推荐他为太仓署的官吏,今集中有《太仓箴》一文,似可为证。约此年底,李商隐入华州刺史崔戎幕中任职。《樊南甲集序》有云:“后联为郭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7][P.1713]}李商隐的骈文功底大致就是在令狐楚幕与崔戎幕中打下的。大和八年(834)十月,李德裕罢相。十一月,李德裕出为镇海节度使,辟杜牧弟杜顗为巡官,杜牧有诗送行。此年冬,李商隐准备赴京参加来年的进士试。

开成元年四月,令狐楚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十一月,李德裕由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改任浙西观察使。令狐绹于此年迁任左拾遗。李商隐东归洛阳时写信与其别。开成二年(837)五月,牛僧孺由淮南节度使转任东都留守。此年春,李商隐进士及第,随后东归济源省母。及第前写《上崔华州书》,向崔华州表示自己“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的创作主张以及“不屑衣袖文章,谒人求知”的狷介个性。及第后随即写信给令狐楚,表达感激之情。十月,令狐楚病重,急召李商隐赴兴元代草遗表。十一月十二日,令狐楚卒于山南西道观察使任上,享年72岁。十二月,李商隐与令狐绹兄弟护送令狐楚的灵柩回长安,在途中写下了长篇史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开成三年(838)春,李商隐应吏部博学宏辞科的考试,先被

吏部选送中书省,不料一位“中书长者”认为“此人不堪”,大笔一挥将他抹去,此事详见李商隐《与陶进士书》。落选后,李商隐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在泾原愤而赋《安定城楼》,虽然不快,但依旧有“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澹宕。入幕后,王茂元赏其才,以小女妻之。冬,杜牧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杜牧本年作《上淮南李相公状》,称颂李德裕治理淮南的功绩。开成四年(839)春,李商隐自泾原赴京参加吏部书判拔萃科考试,中选后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夏,调任弘农县尉。在弘农尉任上不久,即因“活狱”一事触犯上司孙简,李商隐愤而提交以诗的形式写成的辞呈。恰在此际,孙简升迁,姚合接替。经其挽留,李商隐继续担任原职。开成五年七月,召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德裕入朝。九月,李德裕拜相。大约九月后,30岁的李商隐以到长安“从调”的理由从弘农尉任上辞了出来。秋,李商隐有《酬别令狐补阙》诗。该诗末两句“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已显露出二人间的隔阂。去长安后不久,已出镇陈许的王茂元召李商隐入幕。

武宗会昌二年(842)春,李商隐再次参加吏部试,通过后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大约冬季,母亲去世,李商隐居丧去职。也就在此年春,杜牧出为黄州刺史,他认为这是李德裕在有意排挤他。在外遣的几年中,杜牧向李德裕接连上书为国事献计献策,李德裕称之,但依旧无要用他的意思,杜牧怨怼。会昌四年(844)三四月间,李商隐移家永乐,此年冬,永乐大雪,李商隐作忆雪、残雪诗寄给长安的旧同事,显露向往之情。会昌五年(845),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七月,敕并省天下佛寺,令僧尼还俗。在池州任上的杜牧上书李德裕论对付江贼的政策。五月,杜牧罢相,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本年正月十五,李商隐听说长安闹花灯,惜自己“身闲不睹中兴盛”,作《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秋,李商隐收到时任右司郎中令狐绹寄来的书信,回以《寄令狐郎中》诗,向其表达了寂寞无助的处境和心情。十月,李商隐服丧期满,不久返回长安重任旧职。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服食丹药而亡,年33。宦官集团拥立皇太叔光

王李忱,是为宣宗。四月,李德裕罢相,出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36岁的李商隐任秘书省正字,所谓“我时憔悴在书阁,卧枕芸香春夜阑”(《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大致就是他这一年的生活境况与落寞心境。

宣宗大中元年(847)二月,敕令兴复佛寺。二月,李德裕由东都留守改为太子少保、分司;李党重要成员郑亚由给事中出为桂管观察使。十二月,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本年三月,李商隐应郑亚之辟,任掌书记,随之远赴桂州,并代郑亚致书李德裕,见《樊南文集补编》卷二《为濮阳公上李太尉状》^②。八月,李德裕自编会昌年间所写文章为《会昌一品集》,嘱郑亚为序。李商隐为之起草序文。又为之作书德裕,称赞其会昌功业,认为其“以大手笔,居第一功”^{[7](P.1613)}。大中二年(848)二月,令狐绹以知制诰充任翰林学士。二月,杜惊转任西川节度使,桂管观察使郑亚贬为循州刺史。九月,李德裕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十月,牛僧孺卒于东都,享年69岁。本年八月,46岁的杜牧擢升为尚书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十二月抵京。杜牧所撰牛僧孺墓志铭当为本年或稍后所作。在铭文中,杜牧对牛僧孺推崇备至,而对李德裕大加贬损,立场鲜明。本年初,李商隐仍在郑亚幕中任掌书记,为之起草致马植、卢言、杨汉公启,申辩己之冤情,驳斥、揭露他人的诬陷之辞。李商隐有伤李德裕的《李卫公》《旧将军》《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等诗或也作于本年。二月,郑亚被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失去幕职,不久北返。约于九月,抵达长安。十月,参加选调后被任为盩厔尉。不久,被京兆尹看中,遂留下任职,专掌表奏之事。大中四年(850)春,杜牧转任吏部员外郎。秋,杜牧出为湖州刺史。临行前登乐游原,赋《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诗,寄无限感慨于昭陵一望之中。大中五年春,卢弘止卒。李商隐幕府罢归长安。史载,李商隐“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绹,乃补太学博士”^{[6](P.3210)}。七月,李商隐应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之辟,为掌书记。不久启程,约于十月底抵达梓州。十二月,李商隐奉柳仲郢命以侍御身份前往西川节度使府推狱。从此,他再也

没有回到长安朝堂。

在牛僧孺和李德裕身后,李商隐褒李悼李,杜牧褒牛悼牛,政治态度鲜明。然而,历史总是与众多的人和事相牵绊。被当时和后世加以无尽猜测的李商隐是否背恩,李商隐究竟属于李党还是牛党?杜牧褒牛贬李纯属个人恩怨还是政见所致?“人们在叙述有意图的情节的背景下同时也在介绍某种类类似于历史联想空间的东西,让人们能够想象历史行动者们当时所处的境况、时代特色以及他们的外貌举止等等。人们在通过沟通而传承过去的同时,也在附带地承载着历史。这时,叙述者不知不觉地、附带地和无意识地承载着历史。”^{[12](P.7)}长安朝堂上的聚讼党争导致政见不一,在对待藩镇割据的问题上,“小李杜”的诗文亦有鲜明的表现。

(二)维系统一的中枢功能:藩镇割据

晚唐王朝的统一是通过长安的中枢功能实现的。在唐廷对地方的不断弹压中,唐帝国才没有在“安史之乱”后很快地分崩离析。

敬宗宝历元年,尚未及第的杜牧作《上昭义刘司徒书》。刘司徒即宪宗朝李师道的部将刘悟,因杀李师道归顺有功,朝廷遂任之为义成节度使,后移任昭义节度使,长庆元年(821),朝廷为了进一步笼络他,又授以“检校司徒”的虚衔。但刘悟长庆后渐不听命,卢龙将领朱克融叛乱,朝廷调刘悟为卢龙节度使征讨朱克融,刘悟不从,反为朱克融求情。杜牧作《上昭义刘司徒书》的目的就在于劝诫刘悟以国家利益为重,劝其为国讨叛诛逆,诫其拥兵自重。

文宗大和二年杜牧任校书郎期间,曾见过吴元济灭亡后投顺朝廷的淮西降将董重质,向他调查淮西何以四年不破的原由。数年后他回忆此事云:“某大和二年,为校书郎,曾诣淮西将军董重质,诘其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自夸勇敢多算外,复言其不破之由,是征兵太杂耳。”^{[8](P.164)}大和四年正月,时任武昌节度使的牛僧孺召还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二月,兴元军乱,节度使李绛被害。大和五年正月,幽州发生叛乱,副兵马使杨志诚逐走幽州节度使李载义,文宗听从牛僧孺的建议,实行姑息政策,任

命杨志诚为留后。大和七年(833)正癸丑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加同平章事。据《资治通鉴》载,他本以忠义自任,入朝后见朝政紊乱,又士大夫多请托,回去后,变得骄纵起来,不太把朝廷放在眼里。大和八年(834),时在淮南幕中的杜牧因愤于藩镇跋扈,朝廷无力,作《罪言》《原十六卫》等时政论文。

会昌二年秋,杜牧作《郡斋独酌》,写出了杜牧对于藩镇割据和唐廷对藩战事的看法。诗人表彰英武将帅、呈现割据藩镇之不义。其中“我爱李侍中,漂漂七尺强。白羽八札弓,骍压绿檀枪。风前略横阵,紫髯分两旁。淮西万虎士,怒目不敢当。功成赐宴麟德殿,猿超鹤掠广球场。三千宫女侧头看,相排踏碎双明珰。旌竿嫋嫋旗嚒嚒,意气横鞭归故乡”是对李侍中(李光颜)武功的敬慕,关涉宪宗元和十年(815)至十二年(817)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之事。“光颜迁忠武军节度使。会朝廷讨吴元济,诏光颜以本军独当一面。贼众压光颜之垒而阵。光颜乃自毁其柵之左右,出骑以突之。光颜将数骑冒坚而冲之,出入者数四,贼乃大溃。光颜败元济之众。贼平,命中官宴光颜于居地,又御麟德殿召对,赐金带锦彩,已而进阶开府仪同三司,仍于正衙受册司徒兼侍中。”^{[13](P.27)}“犀甲吴兵斗弓弩,蛇矛燕戟驰锋芒。岂知三载几百战,钩车不得望其墙”,表彰裴度战功赫赫,平叛安邦。宪宗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亲自挂帅督军。十月,唐随邓三州节度使李愬夜袭蔡州,入城,擒吴元济,淮西平。唐廷讨伐淮西叛镇的战争历时三年结束。唐廷平定淮西极大地震慑了各大藩镇,有力地维护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14](P.7765)}唐廷的讨叛战争获得成功,至此形成了一定的中兴气象,可惜,随着宪宗的暴亡,朝廷再次失去了稳定的核心,藩镇复叛,一切遂如昙花一现般地过去了。但这段辉煌的历史对人心的影响却是持久的,元和成为杜牧、李商隐这一代人热切向往的时代。杜牧的元和情结尤为浓烈。杜牧《感怀诗》作于登第前一年(大和元年),诗中盛赞“元和圣天子”,八年后的《上知己文章启》中又云“伏

以元和功德,凡人尽当歌咏纪叙之”^{[18](P.241)},张方平说他是“不遇元和得献谏,望山东北每长嘘”^{[15](P.24)},可谓深中其心。关于杜牧的元和情结,李商隐在《韩碑》诗中也有明显的流露。李商隐赞同韩愈《平淮西碑》的观点,高度评价裴度的平叛功绩,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后世对杜牧《郡斋独酌》与李商隐《韩碑》的评价不绝如缕,可见读者通过他们的诗作在回溯晚唐藩镇割据中的长安朝堂,而诗歌所展示的长安的文化政治军事场域的功能性也被后人所认可。

武宗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秘不发丧,自称留后。五月,朝廷下令征讨刘稹。大约七月前后^{[16](P.382)},杜牧上书李德裕,建言对刘稹用兵策略。同年,李商隐为王茂元作书与刘稹,历数其叛逆大罪,对其晓以大义,喻以祸福,劝其归顺。会昌四年八月,昭义将领郭谊杀刘稹。在李德裕的坚持下,朝廷继续征讨郭谊,九月,诛杀郭谊。昭义平定。是年,杜牧向李德裕连上两启,一为《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盛赞其平定叛乱的武功。

长安的功能性记忆集中体现于唐廷对于王朝的管控上,而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不仅牵涉民族关系、外交关系,而且牵动长安城的帝王百官,能否治乱安邦也影响着帝国境内所有辖区的康泰。

(三)对外交往的象征功能:河湟地区与北境

大唐对外交往频繁,而长安因其地缘及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长期处于核心位置。尽管晚唐长安已经衰微,但在民族交往中其象征意义并未稍减。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9](P.6104)}河湟指今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及湟水流域,即唐与吐蕃的边境地带。湟水是黄河上游的支流,源出青海东部,流经西宁,至甘肃省兰州市西汇入黄河。“安史之乱”后,驻守在河西、陇右的军队东调平叛,吐蕃趁机占领河湟地区。武宗会昌元年(841),唐边境持续动乱。二月,回鹘残部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屯集漠南,数度侵扰天德一带边境。会昌二年,李德裕主张抵御入侵,并积极备战。会昌三年正月十一日,石雄等将领率军大破回鹘乌介部。会昌四年,杜牧向李德裕连上两启陈述对回鹘

用兵的策略,其二为《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而杜牧作于会昌四年三月之后的《皇风》,“何当提笔侍巡狩,前驱白旆吊河湟”则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想要取得“边功”的志意。会昌五年春正月己酉朔,宰臣李德裕、杜悰、李让夷、崔铉、太常卿孙简等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地方官跟随上表奏贺,李商隐作《为河南卢尹贺上尊号表》一文上表祝贺。

宣宗大中三年(849)二月,吐蕃内乱,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归。八月,唐收复河湟。当月,杜牧写《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其喜悦之情可见一斑。《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三相公长句四韵》以“文思天子复河湟”展露河湟愿景。其实,早在此年春天,杜牧曾将《孙子注》呈献给宰相周墀。追溯其生命历程,杜牧“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此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17](P.980)]。较之一般士人,杜牧知兵、好论兵,与其祖父杜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杜牧献河湟颂诗之时,39岁的李商隐时在长安,有诗赠杜牧,并向其表达了钦佩之意。十一月,李商隐应卢弘止之辟,随往徐州,写下《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自叙会昌末至大中三年末的经历,虽然主旨在己之困顿,对当时政局却涉及颇多。诗中之“上贺嫖姚收贼州”^[17](P.980)]一句,所贺正是河陇地区重新成为唐王朝行政疆域一事。其《樊南乙集序》对此也有详尽描述:“属天子事边,康季荣首得七关;数月,李珣得秦州;月馀,朱叔明又得长乐州,而益丞相亦寻取维州,联为章贺。”^[7](P.2176)]次年,杜牧又作《中丞业深韬略志在功名再奉长句》,可见河湟在杜牧生命中之分量。“小李杜”诗人视角下的河湟较之正史更多了诗情史意。

宣宗大中四年八月,党项为边患,征讨连年无

功。九月,吐蕃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大中五年正月,沙州人张义潮逐走吐蕃军,奉表来报。十月,张义潮平定瓜、伊等十州,遣其兄向朝廷献上十一州户口、图籍。河湟之地遂复归唐有。这一年,杜牧49岁、李商隐41岁。昭宗大顺二年(890),河西、陇右又被党项族占据,终唐之世唐廷再没有控制敦煌以西的地区。

“有些场所具有地形上的色彩,它们的意义完全在于其确切的地点和它们扎根的土地。”^[3](P.27)]长安之所以能够成为“记忆之场”,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较之河湟、北境,处于中原腹地的长安,对于唐廷的统治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之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比起个人的和甚至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的时代的文化的短暂回忆来说都更加长久。”^[10](P.344)]兜兜转转于长安的“小李杜”,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长安,没有离开长安的朝堂。长安作为一个窥探晚唐政局的支点,给了他们目光停驻或者游移的着力之处,对河湟和北境的关注让他们在遥望大唐与吐蕃、党项,或是大唐与回鹘的纷争中,更加关注民族关系、外交关系,也让他们生活的空间变得深广,让后来的阅读者透过他们的笔墨遗存,不仅可以看到艺术的魅力与审美的旨归,同时也可在艺术之上探究城与人,研判城与人的政治历史记忆。

作为大唐帝都,长安朝堂的决策常常牵动四方。而且,唐代的政治史不只是存留于史家笔下,更需要借助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人书写来彰显,在这一过程中,杜牧、李商隐等人关于长安、关于藩镇之乱的文学书写就成为无意识的传承媒介。

历史以诗歌的形式加以情感化的记录,长安承载着河湟、藩镇及朝堂之乱等历史事件穿越无限的时间与空间,成为历史的记忆。“记忆之场”中的功能性场域,只是因为它们成为某些事件的策源地才进

入记忆之场的,该场域在其中“担当了记忆的塑造和传承的职责”^{[31](P.20)}。晚唐政局均与长安朝堂息息相关,而“小李杜”无论身处僻远还是为政僚属,均热切关注国家是否安定平和。他们通过长安关注到多个藩镇所在,长安在他们的诗文笔下成为晚唐政治记忆的塑造之地、传承之地。我们在阅读这些诗文时,通过他们的想象形塑着彼时的历史天空,历史竟由此变成了新的记忆出发之地。作为诗人的“小李杜”,在身历的诗坛中,对于时代诗学思潮的考量及其与重要诗人的交游更加强化了长安作为“记忆之场”的象征性功能。

三、“小李杜”的逐梦之所——长安“记忆之场”的象征性意义

唐朝国都长安城作为君国一体的象征,是皇权的核心所在,王朝的政治权力演变也集中于此。名利功勋、荣辱浮沉,士人的一切机会与可能都在这个纷繁的场域上演。受儒家传统思想熏染的华夏士子,“学而仕”乃其毕生之追求,长安作为唐帝国的都城,是士子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因而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进入长安是接近功业理想的启端,“记忆之场”的象征性“通过某个事件或某个仅有少数人体验过的经验而描绘了大多数人的特征”^{[31](P.20)},“喜得近京城,官卑意亦荣”(王建《归昭应留别城中》)是士子们的普遍心态。于是,长安成为个体人生价值得以体现的最佳之地,是否居于长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士子衡量人生得失的标准。无论初盛中晚,唐人一旦远离长安,就会慨叹“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刘禹锡《谪居悼往二首》其二)。充斥着权力、梦想与荣耀的长安城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士子,他们百川聚海一般涌入这个繁华之都,企望尽情展现自我,挥洒才华。因而,长安在唐帝国地域性的本质之下,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不仅象征着繁荣鼎盛的王朝、象征着国家与民族,而且象征着功业理想与抱负。这种文化对唐人产生的向心力将唐王朝与所有唐代士子凝聚起来,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感相融合,继而共同呈现在诗歌中。诗歌作为记忆传承的

媒介,将长安这个场域承载的历史记忆保留下来。

据杜牧著、冯集梧注的《樊川诗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杜牧现存诗歌520首,其中长安诗共118首,占比近1/4。其中编年诗73首、未编年诗45首。^③据李商隐著、叶葱奇疏注的《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李商隐现存诗歌699首,其中长安诗83首,占比近1/8。其中编年诗54首、未编年诗29首。^④“我们总是在历史的城市建筑群的框架之内活动,从建筑史和城市建设角度看,这些建筑群可能是没有历史和没有面貌的,但他们却总是在以水泥、砖石和沥青的形式代表着物质化的历史时代。”^{[2](P.8)}杜牧和李商隐们对长安城及周边建筑物的书写是无意图地将其作为历史记忆的媒介加以传承,而对以长安为媒介辐射开来的中外关系、藩镇变乱及宦官专权、朝堂党争的书写则是有意识地把长安作为历史事件生长的媒介加以凝望。

作为士人,“小李杜”在长安这个场域中、在历史回忆的支点上扮演着晚唐政治史的言说者。作为诗人,他们对晚唐诗歌群体同样有着自己的叙述,透过对李贺的评判、透过杜牧为友人李戡所写的墓志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不同的诗学观念和审美旨趣,在他们用自己的才华践行自己的理念时,晚唐诗歌世界中的诗学思想也因此异彩纷呈。

(一)对李贺的评判

元和十一年(816)二月,姚合等人进士及第。此年,李贺客游潞州三载,归卒,年27岁。李贺出身唐朝宗室大郑王(李亮)房,门荫入仕。作为外省人,李贺于元和七年十二月前往长安,授奉礼郎。李贺诗对其身后的诗人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李商隐的影响更大,李商隐集中有不少长吉体诗。李贺逝后15年,大和五年十月,在宣州幕的杜牧为李贺的诗集作序。序中,杜牧对李贺诗有褒有贬,褒的是其“辞采章句”,贬的是少了点“理”。所谓“理”,大致指思想内容。杜牧论文强调“文以意为主”,所谓的意与理均指与“辞采章句”相对的思想内容。杜牧生于“奉儒守官”之杜氏家族,儒家的思想观念深入其心。作为长安本地人,杜牧青年时代成名意味着

他很早就名满天下,其诗歌的“俊爽”之风与唯美而至靡曼的李贺、李商隐的诗学思想大有不同。杜牧的诗歌风格形成较早,李贺对其影响不大。虽然李贺诗集在杜牧作序后行于世,但在此前,其诗早以零散的形式流播于世。李商隐的《李贺小传》虽文章不长,但所采两件轶事流传广远。一是李贺出行,驴背负锦囊,有诗思辄记并投囊中;二是李贺临终,有仙乐临空,是仙界迎其返归。李商隐刻画了李贺的志奇人奇,上苍怜其才、人世却乏解其境遇,在感喟之际也抒发了个人之愤懑。李商隐此文对后人了解李贺起到了很大作用,人们津津乐道“诗鬼”李贺时,对其状貌、言行多举此文为例。对于外省人来说,长安可能是一个不能忘记又不能离去的地方,是一个欢乐乍现就凋落的地方。很难说李商隐对李贺诗歌美学的认同是因为同为外省人,但他们的个性确实具有相同之处,生活中的某些体验是相同的,诗学理念有相通之处也是不可否认的。

“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3](P.21)}李贺、杜牧与李商隐的诗文清晰地再现了晚唐长安的社会风貌与人文环境,而李商隐、杜牧对于李贺的评判成为长安场域中诗人代际更迭如何接受的显在范例,代际更迭中不止有审美范式,更重要的是诗学理念的延续,一代诗人群体的诗学理念汇聚成时代的诗学思想,不同代际呈现的诗学思想成为时代风貌,并最终展示为大唐的诗学思想。而长安作为唐朝皇都的面貌存在于诗文之中,与萦绕其上的诗学脉动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印象。

(二)李戡的墓志铭

文宗大和九年七月,杜牧好友李甘因反对郑注被贬窜为封州司马,杜牧忧惧之下,托病得以分司东都洛阳。在洛阳期间,杜牧与李戡结交。后,李戡去世,杜牧为其撰墓志铭,并在铭文中记载李戡生前对元白诗的评述。“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嫖语,冬寒夏热,入人

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8](P.137)}作为李戡语言的记录者,杜牧显然知道在墓志铭中如何择选,而他的选取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自己的观点。无疑,杜牧对元白诗采取了摒弃的态度,他认为元白诗“通俗纤艳”,应该被贬斥。杜牧评述元白诗所展示的诗学理念对身后的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吊诡的是,就在杜牧写下李戡墓志铭的这一年,他在洛阳巧遇歌妓张好好,杜牧感旧伤怀,作《张好好诗》。与杜牧相比,李商隐虽然也是坚定的儒生,但他青年时期(从宝历年间到大和初年)的学道经历对其影响深远,思想也相对驳杂。早年,李商隐曾有“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6](P.2256)}这样令人一震之问。在《上崔华州书》中写道:“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也?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6](P.108)}由此可见,李商隐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勇敢且敢于质疑儒家基本原则的人。他的诗歌理念也殊少中正平和、温柔敦厚旨趣。

然而,无论杜牧和李商隐的诗学理念如何不同,他们都积极入世,想要踏入长安朝堂,以儒家思想为道德伦理和行为操守,力图实现治世理想的仕途。从这个角度看,李商隐这个阴郁内向的外省人和杜牧这个俊朗豪气的本地人在诗学思想上的分野与其家世占籍并非全无关联。生于长安的杜牧自幼受到杜氏家族文化的濡染,杜氏的家世儒风对杜牧诗学理念的陶育不言而喻。在远离长安的幕府岁月中,尽管杜牧也曾流连江南青楼,但诗学思想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尽管世人会传说杜牧“娉娉袅袅十三余”之类诗句之绮靡,却无人认为他的诗歌配不上“俊爽”二字。“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这首《长安秋望》是最能呈现杜牧诗歌风格之作,也是长安馈赠给杜牧的礼物。长安世家子弟的豁落人生与外省由小康陷入困顿的读书人的豁落人生大不相同,长安带给杜牧的自信是他在生命最黯淡时也不会抹去的底色,晚唐万方多难的朝局激发了杜牧报国济世的抱负,而他生长的长

安是距离实现建功理想最近的地方,他不期而然地有来自皇城根儿的责任与豪情,因而诗风爽健、诗作俊逸很自然地成为杜牧的美学旨趣。生于河南的李商隐,10岁父丧、12岁始受业于处士叔李某——其人精通五经、“小学通石鼓篆与钟、蔡八分,正楷散隶,咸造其妙”(《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期间还有过一段“学仙玉阳东”的经历。作为一个外省人,李商隐汲汲于通过科举考试来到长安。而长安始终与李商隐若即若离,李商隐与这个渴望成为故乡但却不断被摒弃的城市间的情感是纠结的,长安没有带给他自信与豪情,反而让他郁结幽怨,时常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徘徊杳渺。如此与理想相伴的缠绕情感影响着李商隐的精神气质和诗歌美学风尚。

长安城内的恢宏建筑与地理景观在杜牧笔下有着多样的描述,他心中的长安承载了杜氏家族的历史记忆。长安在杜牧心中已不再单纯是一座皇都、一座帮助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希望之所,而是“故园”、是家乡,是杜牧一生所思所念、魂牵梦绕的地方,所谓“花落寒轻倦客归”(《朱坡绝句三首·其二》)^{[18](P.6003)}的地方。在杜牧现存的36首出现“长安”的诗作中,有15首的诗句中都有长安字样,12首诗题中有长安字样。相较杜牧,作为外省人的李商隐的作品要少一半,只有18首出现“长安”的诗歌,但情感并不稍减。长安所凝聚的“小李杜”的文学地理情结在诗文中展露无遗。“文学地理情结的形成,还紧密连接着民族、家族以及文人外任贬官一类的地理迁徙,他从这个地域到那个地域的民俗反差和精神体验。”^{[19](P.33)}他们在长安和地方的迁转流徙中感受着长安与地方的参差变化,也和家人及诗人群体牵绊勾连。文宗开成三年冬,杜牧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接到任命后,杜牧将病弟护送到当时在浔阳的堂兄杜慥处照料,次年始赴京任职,事见《文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武宗会昌元年四月,杜牧长兄慥自江州刺史转任蕲州刺史,杜牧兄弟随同前往。七月,因杜顗不愿回京,杜牧独自返程。武宗会昌五年,张祜来池州,与杜牧唱和往来,九月九日,同

登齐山,并赋诗。这首安慰张祜赋下的《九日齐山登高》虽然也是晚唐名作,然而较之《长安秋望》还是不及。因为《长安秋望》透出的高蹈是晚唐诗歌所罕见的,它凝聚了来自政治文化中心长安的昂扬自信。虽然李商隐30岁就定居于樊南,也把自己的集子定名在兹,然而,他并没有选择逝于斯土,当他最终归于尘土的时候,长安于他象征理想、象征辉煌的意义也就消逝了。

杜牧和李商隐在以长安为轴心辐射开来的仕宦生涯中往复回转,与曾经在这条路上走过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李贺、刘禹锡,隔了岁月瞻望长安的星空。他们以及他们之前和之后的诗人群体,在诗歌中所呈现出来的“长安情结”彰显了长安城巨大的向心力,其对长安士子的凝聚作用也增进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长安这个场域作为“记忆之场”的象征性意义也得以清晰呈现。

小结

或许现代的长安相较于唐代的长安城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不同,如城市建设与布局、城市面积与城市职能身份,甚至名称都与唐代完全不同,但在以杜牧、李商隐的诗歌为代表的晚唐文学作品和历史档案的记载中,皇都长安已经与我们对唐代的记忆风景融合在一起。每当谈及晚唐,历史的记忆总会把我们带回曾经那个时代的长安面貌中,用我们积淀的所有关于“小李杜”的知识复现当年属于这个场域的生动画面——杜牧的樊川别业和李商隐的樊南新居带来的物质性的长安;河湟争夺、藩镇割据、宫廷政变、牛李党政带来的功能性的长安;围绕李贺、元白诗学认知带来的象征性的长安。诺拉说过:“记忆之场的主旨在自我回顾,它被复制到变形的镜子中,这镜子才是它的真实存在。”^{[3](P.22)}现代的西安才是真实的存在,但该场域因其曾经对晚唐一代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被记忆,因而是记忆的场所。长安既是历史中的长安城,又是现代的西安,它们之间虽然跨越了千年的历史,却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存在于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是每个拥有

长安梦的士子心中的悸动,也是千年后现代人回望历史时与古人的交流之所在。

注释:

①转引自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②据钱振伦考订,濮阳为荥阳之讹。

③此统计数据主要依据缪钺《杜牧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并参考胡可先《杜牧诗文编年补正》(载《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曹中孚《杜牧诗文编年补遗(摘编)》(载《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王西平《杜牧诗系年考辨》(载《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王西平与张田著《杜牧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吴在庆《杜牧论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等。

④此统计数据主要依据李商隐著、叶葱奇疏注的《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附录《年谱》。

参考文献:

- [1]陆威仪.世界性的帝国:唐朝[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2]迈克尔·苏立文.中国艺术史[M].徐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3]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4]管子[Z].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5.

[5]刘熙载.艺概(卷二)[M].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都官书局铅印本.

[6]刘昉,等.旧唐书(第3册)[M].陈焕良,文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7.

[7]刘学楷,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8]杜牧.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1]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3]杜牧诗集[M].冯集梧,注.陈成,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1)[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5]张金海.杜牧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6]傅璇琮.李德裕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7]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8]全唐诗(卷521)·第8册[Z].中华书局编辑部,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99.

[19]杨义.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从叙事学、诗学到诸子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Chang'a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in Xiao Li Du Poems

Mi Yanqing

Abstract: As the capital of the Tang dynasty, Chang'an has derived multiple social networks and become a memory field. Chang'an's field of memory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oems of Xiao Li Du: Du Mu's Fan Chuan Bieye and Li Shangyin's Fan Nan new residence bring material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court coup, the Niu Li Party struggle, the Tang dynasty military governor separatist regime, and the Hehuang struggle have brought functional features; It brings symbolic characteristics around Li He and Yuan Bai's poetic cognition. They serve as conditions for each other and become the basis and motive force for readers in different times to feel Chang'an, and take Chang'an as the core to break through various boundaries and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and identify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Du Mu; Li Shangyin; Materialization; Functionalization; Symbolic Characteristics